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

The Communication History
of Shi in Zhou & Qin Dynasties

李马集题



□ 马银琴/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周秦时代



The Communication
History of Shi in Zhou &
Qin Dynasties

的传播史

□马银琴/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马银琴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2384 - 5

I. ①周… II. ①马… III. ①诗经 - 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5768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

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

著 者 / 马银琴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宋淑洁 关志国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宋建勋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7.5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277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384 - 5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05CZW008）

出版前言

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的郑重推荐，将逐年推出本所学者尤其以青年为主体的新作。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博士文库”、“青年文库”，这个文库更多的是留下他们在“青年”、“博士”之后继续前行的足迹。基于建所重在出人才、出成果的思路，期待着这里能涌现出一批将来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

自1953年建所以来，我们就执著地追求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所风，力戒浮躁，崇尚有根柢的创新。创新而无根柢，易成泡沫；讲根柢而欠创新，易成老木疙瘩；创新与根柢并重，才是我们增长实力、开拓新境的基本方法。文学所一代代学者的成长，都在实践着这一基本方法，避免了不少追波逐流或攻关抢滩之弊，培养了一批为中国现代人文建设做着实实在在工作的学人。如果要我不那么谦虚地说一说文学所的长处，这长处就在于从前代学者就开始了的文献功夫和贯通意识，以文献站稳脚跟，以贯通迈开脚步，以新材料、新思维、新发现，走向现代学术的深处、广处和前沿。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期待这个学术文库成为文学所的学风、学养和学术基本方法的历史见证。有期待的写作与有期待的阅读，其可成为人生之乐事乎？

走进新纪元的文学研究所，总要有一种与我们民族全面振兴相适应的文化姿态和文化行为。小康社会应有学术文化的“小

康”。文学所近期正在启动三项学术工程：其一是这套“学术文库”，主要收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新作，代表着我们的希望。其二是“文学研究所集刊”，重点发现本所学者见工夫、有分量的长篇论文，展示我们的学术阵容和实力。其三是“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重新汇集出版本所在1950年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史文献，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还准备选刊一批重要学者的名作精品，这反映着我们应该继承弘扬的传统和值得珍视的历史记忆。文学所和它的学术委员会愿为这些学术工程付出不懈的努力，以开辟文学研究的广阔的途径和富有生气的新境界。谨请学术界高明之士和新锐之友不吝赐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员 杨 义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

序

王小盾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闪光的年华。对研究者来说，提出一项较高质量的成果，应该就是他生命的一次绽放。不过，就像大自然的飙风电火一样，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并不多，所以从前有所谓“一本书主义”。但是，在六年时间里，我却是第二次为马银琴写作书序了。我面对的是又一份新鲜而饱满的学术成果。六年两度为一位年轻学者的光华作见证，对于我来说，这自然是一件快慰的事情。

我在阅读本书稿的同时，也重读《两周诗史》一书，观察了这两部作品的联系与区别。我的想法是：从联系的角度，可以看到作者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从区别的角度，可以看到她抵达的新里程。这就好像是观看一位智者的攀登，是一件既有认识意义又有欣赏价值的事情。

那么，我从阅读中收获了什么呢？

首先，我看到了《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这本书的新高度。它有以下标志。

（一）它对周代礼乐制度下诗歌传授的两个系统——注重诗声的乐人系统和注重诗义的国子系统——作了全面论述。关于这两个系统，王国维曾经从音乐文献学的角度作过讨论，《两周诗史》曾经从《诗》形成史的角度作过讨论，本书则进一步从教育史和《诗》传播史的角度作了讨论。其意义得到更深刻的阐明。事实上，这两个系统也就是文化传承的两种方式，即乐师方式和史官方式，或曰口述方式和文本方式。《诗》形成的时期，正是这两种方式发生剧烈冲撞的时期，所以在关于《诗》的阐释文献中容纳了很多彼此矛盾的说法；随着史官进入文化传承的中心，《诗》

2 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

的传播也由口头的传播、声音的传播逐渐转为文本的传播、义理的传播。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文学史”形成在这一过程之后，所以主体上是书面文学的历史。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古今研究者都从“文本”出发来观看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这种观看，自然看不清楚《诗经》的原貌——看不到“本文”。因此，阐明周代礼乐制度下诗歌传授的两个系统，便真实地再现了《诗》的早期生存。这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二）它综合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对春秋时代赋引《诗》的风气作了重新讨论。关于《左传》等书所记载的赋诗、引诗，顾颉刚、朱自清等人从《诗经》地位和功能的角度作过论述，台湾学者则在《左传赋诗引诗之研究》、《左传称诗研究》、《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等专著中讨论了这些活动的概况、宗旨、功用及其对后世诗学的影响。本书的特色在于视野更加广阔：一方面，它把赋引诗看作仪式歌奏之外的诗歌传播方式，在对比的意义上作了讨论；另一方面，它对《左传》、《国语》所记赋引诗的事迹，用表格法、坐标法加以统计，进而讨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赋诗引诗之风会在鲁僖公时代兴起？为什么这种风气在经历了襄、昭时代的高峰之后，会在鲁定公时代突然回落？为什么引诗风气在哀公时代能够回升，而赋诗风气却从此走向沉寂并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等等。在追问和答问之间，它也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春秋时期《诗》的社会功能。

（三）它对战国至秦统一时期《诗》文本的流传作了分阶段、分地区论述。实际上，它建立了一个以诗学为中心的新的战国文化史观和战国文化地理观。围绕这一主题，它讨论了以下问题：战国时代《诗》在官府与民间所遭遇的不同经历；纵横家、法家、儒家、墨家对《诗》的不同态度；《诗》传播同新产生的私学的关系；儒学的地理分布及其与《诗》传播的关系；子夏传《诗》和三晋之地儒学的发展；稷下学宫与齐国儒学的发展；秦国儒学的生存空间及《诗》在秦国的传播。这些讨论涉及战国文化史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关于一个文学史断层的立体论述。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既注意到了《诗》的传播方式，又注意到了《诗》的生存形态，为新的文学史叙述提供了重要经验。

（四）它从《诗》传播史的角度考察了战国楚简；以通过统计、分析而建立的文化地理观为基础，对这批有关楚地诗学的新史料作了较全面的解释。其具体做法是：首先根据各种史料，讨论战国时期儒学在楚地的传

播；其次以引诗、解诗方式为重点，对楚简《诗》学资料进行分类考察；然后对《孔子诗论》加以重新编联、释读，并考订其作者；最后，作为对这些考订工作的总结，论述楚简《诗论》的流传与《诗》在楚国的传播。近年来，《孔子诗论》研究已经成为出土文献研究的热点，研究者在竹简编联和文字释读方面作出很大努力。但本书的工作方法与之不尽相同：它注意结合出土文献和存世文献来做研究，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作论证，在比较深厚的知识基础上考察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这种研究，有助于避免仞仞獭祭的毛病。

（五）它对儒家诗教和主要的儒家诗学命题作了富于历史深度的解释。它认为，孔子的诗学主张包括五个命题，即关于诗与志之关系的“诗亡离志”说，关于诗与言之关系的“不学《诗》无以言”说，关于诗之社会功能的“兴观群怨”说，关于《诗》之内容特点的“思无邪”说，关于教学内容及顺序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说。这些命题产生在周代礼乐制度走向瓦解的时代，反映了孔子的诗乐一体的诗歌观念，也说明在孔子心目中，重建社会秩序的政治原则逐渐被伦理道德原则所取代。它认为孟子的说诗理论主要有“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两个命题。这两个命题意味着：“诗人”开始作为被解读的对象出现在教诗者的视野当中，儒家诗教形成了独立品格，诗歌作品的本体地位开始确立。因此，孟子学说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正式形成的标志。它还认为，荀子是先秦儒学向经学转化的关键人物，一方面确立了尊崇经典、树立权威的意识，另一方面又主张把《诗》、《书》视为礼的附庸和宣扬忠信伦理等政教观念的手段。它结合文学史、经学史、文学理论史等多种学科的思路与方法进行论述，因而较圆通地解释了学术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

在我看来，以上是《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一书的新特点。而从该书和《两周诗史》的共同点看，又可以看到马银琴在求学过程中一以贯之的若干原则。这些原则并不复杂，大致有以下五条。

（一）细读原始文献。从《两周诗史》到《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很多新发现都是通过细读原始文献得到的。

（二）充分占有相关资料，不仅占有文献资料，而且占有文物资料和田野遗存资料。为了做到“充分占有”，还要尽量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种相关问题。后一做法，有效地扩大了学术探讨的

4 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

意义。

(三) 用分析态度处理所面对的事物, 将其放在一定时空背景上加以观察和讨论。《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一书最明显的特色, 就是对《诗》文本的流传进行分阶段、分地区论述。

(四) 不仅注意学术史上遗留的旧问题, 而且注意通过资料分析所提出的新问题, 特别是, 注意采用统计法来揭示各种资料中隐藏的问题。

(五) 在经过考据得出新认识之后, 综合史学、文学史、文艺学等多个学科, 从多种角度作进一步研究, 对这些认识加以概括和重新表述, 把它们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

以上五条, 《两周诗史》一书较多地运用了前面三条; 到《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一书中, 后两条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这种情况是在预料之中的。因为我知道, 真正的攀登者, 在不同时候总是会处于不同的高度; 尽管他迈出的是同一个人的脚步。

我和马银琴相识于 1996 年, 那是她选择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作为博士生方向的年头。我曾经有几年时间和她朝夕相处, 那是她进行《两周诗史》的写作, 并构思《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的年头。我目睹了她在学术上的成长, 同时也了解她在思维习惯上的一个优势: 她很好学, 同时有一种把知识系统化的鲜明倾向。这应该她就是她能够进行学术创造的主要原因。好学的习惯使她始终保持朴素的研究风格, 总是从材料出发, 脚踏实地地作论证; 而系统化则意味着对事物结构的敏感, 也就是“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意识。按我的理解, 所谓“辨章学术”, 实即追究事物的逻辑结构; 所谓“考镜源流”, 则是追究事物的历史结构。

2006 年, 我迁居成都, 和马银琴难得见面了, 但也不断听人谈起她的近况。常常有人谈论她新近发表的作品, 于是我知道, 她在进步, 在进行富于创见的工作。又有人说起她的学习, 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一个读书班, 她是骨干成员, 他们每周二下午举行读书会, 目前在读《毛诗正义》, 方法是每人提前准备, 疏通字音字义, 然后一起讨论。除《毛诗正义》外, 即将阅读的古籍有《孝经》、《周礼》、《左传》等。我为这消息感到欣喜, 因为它说明马银琴仍然重视积累, 仍然在学术道路上踏踏实实地迈进; 而且, 她的成功经验已经融入了一个朝气蓬勃的集体。

从 2007 年起, 我在四川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向年轻教师推荐一个文

学史研究的思路，叫做“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我的想法是：未来的文学史，应该面向一个文化实体，而非政治实体；应该研究包括制作、传播、接受等环节的完整的文学活动，而不是简单的写作和鉴赏；应该重点考察重复出现的、长时段的文学现象，而不是文学史上的一次性事件；应该作富于层次的比较研究，注意通过物质去考察精神，通过行为去理解思想，通过社会存在去认识社会意识，以便探知事物和事件的原因和原理。这些想法刚刚开始施行，未必能够成功，但我很有信心，因为马银琴以她的两部著作提供了标本。

2010年10月，我因事到北京。30日那天，由过去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广荣、许继起陪同，看望了病中的老朋友钱竞。钱竞饶有兴致地说：“你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培养了一批学生。培养了一个马银琴，就够本了。”这话有点突兀，但很耐人寻味。广荣的直接反应是：“那王老师就赚的太多了。”我因此不免想起许多学生。比如和马银琴同年入学的博士生何剑平：他以学位论文为基础，撰成80万字著作《中国中古维摩诘信仰研究》，最近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书全面论证了《维摩诘经》和维摩诘信仰进入中国，在中国发展并向日本、朝鲜半岛传播的过程，透彻地讨论了一系列学术专题，从新的角度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空间。他的风格是沉静和坚韧，他走了一条不同于马银琴的道路。如果说马银琴的学术方式是解难题，那么，何剑平的学术方式则是另辟蹊径。两者之间有热闹和冷僻之分，而就其对学术与文化的贡献而言，却可以说难分轩輊、殊途同归。

今天，也就是在写上面几行字的时候，我收到一则短信，说我过去的一些学生——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李方元、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孙晓晖、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喻意志——因某一机缘聚集到厦门，正在讨论中国音乐学术的学统问题。我知道，他们所说的“学统”，也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从资料出发，把考据法和音乐形态分析法相结合的学术传统。这是老辈学者常用的方法，但在全球化、时尚化的热潮中，却不啻是中流砥柱。于是我想到：在解难题的学术、辟新径的学术之外，还有一种守护传统的学术正在实现它的积极意义。

我说以上这些话，意思是：在我眼里，《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有一些特殊的价值。它和《两周诗史》一起，代表了一种富于创新性的

学术方式。它把《诗经》学这门最古老的学问，提升到现代水平，它做了许多拨乱反正、推陈出新的工作，所以受到广泛赞许。这意味着它有典范意义，意味着马银琴成长的道路可以仿效，值得仿效。但应该补充的是：马银琴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有章法可寻，并非出自偶然，不少学者迈出了同样有力的步伐。因此，年轻的学人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做不同的选择——比如智慧之人可以选择解答难题的方式，坚毅之人可以选择开辟新径的方式，深沉之人可以选择发扬传统的方式。我相信，只要像马银琴一样好学深思、坚实持久，那么，在任何一条道路上，我们都能抵达成功。

2010年12月20日于成都狮子山懋堂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周代礼乐制度下诗歌的传授系统	7
第一节 瞽矇传诗——注重诗之“声”的传诗系统	10
第二节 国子之教——注重诗之“言语”、“德义”的 传诗系统	23
第三节 “声教”与“义教”的相互关联与转化	34
第二章 春秋时代赋引风气下《诗》的传播	39
第一节 春秋时代《诗》传播的基本方式	40
第二节 赋引风气产生、衰变的原因及其对诗文本传播的 意义与影响	50
第三章 战国时代《诗》的流传及特点	62
第一节 从“争为战国”到“秦并天下”——战国时代 历史简述	62
第二节 从《战国策》看《诗》在官府中的地位	75
第三节 诸子与《诗》	81
第四章 战国时代儒学的地理分布及《诗》在各诸侯国的传播	99
第一节 儒者的故乡——鲁国	100
第二节 子夏居西河与三晋之地《诗》的传播	109
第三节 稷下学宫与齐国儒学的发展	123

2 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

第四节 战国楚简与《诗》在楚国的传播	143
第五节 周秦时代秦国儒学的生存空间与《诗》在秦国的传播	163
第五章 儒家诗教与儒学传统中的《诗》	186
第一节 从《论语》、《孔子诗论》等看孔子的诗教主张	187
第二节 子夏与《诗》的传授	204
第三节 孟子的诗学思想	211
第四节 荀子与《诗》	229
小 结	242
结 语	244
主要参考书目	255
后 记	264

导 言

现代意义上的《诗经》研究，是伴随着对《诗经》“文学性”的确认开始的。而开此风气的领军人物，就是倡导以“批判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的胡适。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在文学方面，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还他们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价值。”^①两年之后，他在武昌大学发表题为《谈谈〈诗经〉》的演讲时，又说：“《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②这一段话的主旨，是要打破《诗经》的经学枷锁，恢复《诗经》作为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的本来面目。“这些歌谣产生的时候大概很古，但收集的时候却很晚”，为了彻底割断《诗经》与政治的关系，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孔子删《诗》的说法。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从观念和方法上都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诗经》开始被完全当成一部文学书来看待。顾颉刚在《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一文中说：“《诗经》是一部文学书，这句话对现在人说，自然是没有一个人不承认的。我们既知道它是一部文学书，就应该用文学的眼光去批评它，用文学书的惯例去注释它，才是正辨。”^③闻一多在《尺牍匡斋》之

① 胡适：《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1页。

② 胡适：《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70页。

③ 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参见《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第190页。

2 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

六中总结《诗经》研究史时也说：

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①

在他们这一代学者的努力下，持续了两千多年的《诗经》经学与史学研究，迅速地让位于《诗经》文学研究。

《诗经》文学研究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割断《诗经》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关系，抹煞《诗经》在周代社会曾经承担的社会功能及其作为统治手段的工具性质，单纯地把它视为一部歌谣集，“用文学的眼光去批评它，用文学书的惯例去注释它”，认为“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②“你要懂得三百篇中每一首的题旨，必须撇开一切《毛传》、《郑笺》、《朱注》等等，自己去细细涵咏原文”^③。而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诗经》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受到空前重视，赏析与批评一度成为主流。

从文本出发来理解作品的意旨，这是文学作品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我们也承认，《诗经》中的每一首诗，都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传递的是先民心灵的信息”^④。但是，当它集结为《诗》，作为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出现时，每一首诗表现性情的先天特征就被附加于其上的礼乐与仪式所掩盖，礼乐内涵取而代之成为《诗》最重要的品质。正是因为《诗》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作为文学作品被编辑和保存下来的。所以，无论从编定目的、编辑方式还是从文本性质、传播方式上看，《诗》与后世的诗文总集如《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都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纯文学的研究视野不可能认清《诗》的礼

① 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9页。

② 胡适：《谈谈〈诗经〉》，《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75页。

③ 胡适：《谈谈〈诗经〉》，《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77页。

④ 刘毓庆：《从文学到经学·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页。

乐本质与结集过程，同时也就不能真正理解早期《诗》的传播历史。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弥漫于整个学术界的反思风气也对《诗经》研究产生了影响。尽管《诗经》文学研究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部分学者对《诗经》文本性质的反思与重新定位，也推开了《诗经》研究回归传统理路的大门。现代学术视野下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重新介入，为陷入困境的《诗经》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90年代初，董治安先后完成《从〈左传〉、〈国语〉看“诗三百”在春秋时代的流传》与《关于战国时期“诗三百”的流传》^①两篇文章，通过清理春秋、战国时代相关典籍引《诗》、用《诗》的情况，对早期《诗》的流传问题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讨论。之后，集中讨论早期《诗经》传播问题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最近十年间，出现了一批相关的文章。在这些研究中，刘毓庆先生的研究颇值得关注。

刘毓庆是较早关注早期《诗》的传播问题的学者之一。2003年以来，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诗》在先秦、两汉的传承问题，对学术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文章，最后汇集成为《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一书出版。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诗》初成而传播于乐师之中的时候，一种对于《诗》的观念就开始形成了。这种观念携带着人们对于《诗》的理解与诠释，随着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而发生着变化，这就形成了《诗》学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诗》学，便应该是从脱离乐的统治，以独立身份出现于社交活动——春秋赋诗、引诗开始的。而“赋诗”的前提，便是“诗”作为文学的灵动性及无限的可比附性的发现。因而可以说，《诗》学史就是从“诗”的文学本质的发现与把握开始的。^②

这一段话，刘毓庆实际上交代了他的研究视角与思路。他认为《诗》学

① 这两篇文章均收入《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

② 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页。